

回音壁

“翻案”文章须基于事实

——为郑逸梅先生说几句公道话

沈飞德

2019年12月3日早上，上班途中欣见“文汇报笔会”微信公众号当天刚发布罗青先生的《“灰”中有“锦” 八破不破——为海派绘画大师杨渭泉翻案》一文，快速浏览了一遍。到了办公室我又静心认真阅读。这篇文章使我对“锦灰堆”这种国画样式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说获益良多，决非虚语。

罗文之所以会使我兴趣盎然地阅读，要细说原因还是蛮多的。先说文章标题，可谓巧思妙得，雅俗兼备，非常抢眼——“‘灰’中有‘锦’”，马上使我联想到王世襄先生所著《锦灰堆》一书。二是对陌生的所谓海派绘画大师杨渭泉怀有好奇心。我虽不治艺术史，但因工作之故，对从晚清民初到当下海派绘画的各位大师还是有所了解的，突然冒出一个长期蒙冤而尘封的新大师，自然很想知道他究竟为何方神仙。三是这“翻案”一词，因关涉百年海上画派，兹事非小，自然非看不可。

再说文章内容，一看就让我欲罢不能，因为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杨渭泉“百年奇冤”的制造者郑逸梅先生。郑逸老（1895—1992）生前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从1980年代中到他1992年去世，我因是文史馆安排给我的联络员，再加上我编辑《上海文史》，故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文章和书，读过不少。他的道德文章，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罗文说的“郑代笔”郑达甫其人，我印象中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像是上海文史馆已故馆员。

读罗文，我的感觉是由喜而惊，继而生疑。疑问之一，郑达甫是否杨渭泉的代笔？之二是文史掌故专家郑逸梅先生的真的诬枉杨渭泉了吗？他的那篇《杨渭泉“锦灰堆”的代笔人》行世后怎么会生出那么大的威力，竟会使“杨家锦灰堆八破图”对中国近代艺术史的贡献灰飞烟灭？

我当即从书橱里拿出《馆员名录——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六十年 1953—2013》（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寻找郑达甫。事实证明我的记忆不错。关于郑达甫，名录是这么介绍的：“郑达甫（1891—1965）[180—1956036] 别名孝纲、佐宸，浙江镇海人。曾任镇海辅德小学、普益学校教员，镇海县政府书记，后专事绘画，擅中国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流行的‘锦灰堆’之作，大多出于其手笔。”我知道文史馆的这本名录编写的经过，也曾参与其事，该书资料来源都是依据馆员本人的档案材料，是第一手的，也可以说是有权威性的。这段郑氏简介，赫然写明其代笔“锦灰堆”确有其事。真是那样，郑逸老所写《杨渭泉“锦灰堆”的代笔人》所讲内容也非“戏说”故事了。

我读郑逸老不足千字的“代笔人”全文，感觉其文充其量是篇述事记人的文史掌故，不至于如罗青先生所说的“讽刺攻讦”。何况我了解的事实决非罗文所说，我若视而不见，沉默不语，使郑逸梅先生枉背抹杀杨渭泉父子杰出艺术贡献的恶名，于心不安。因此，我应该为郑逸梅先生说几句公道话。

要解决我的疑问，还是要进一步从郑达甫其人着手。“馆员名录”显示，郑达甫1956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是第180位馆员，与他同批入馆的有丁悚、马公愚、王个簣、朱屺瞻、吴湖帆、陆小曼等45人；他的卒年是1965年（11月7日），而非罗文说的1956年。知悉郑达甫的别名孝纲、佐宸很重要，这样就可以避免把落款郑孝纲或郑佐宸的作品误为“锦灰堆”的第二代画手了。

郑达甫进文史馆的确切时间是1956年4月1日。上海市文史馆成立于1953年6月，其时聘任馆员的基本条件是“文、老、穷”，或“文、老、名”，概言之就是聘任的对象需要年高德劭，有社会影响，生活有困难的文化老人。馆员在聘任前，有关部门按例要派员到拟受聘人士居住地的公安局或派出所作全面的情况调查，填写“上海市社会失（无）业高级知识分子调查表”，作为选聘馆员资格审查的重要依据。郑达甫在入馆后的次月亲笔填写“馆员情况调查表”。同年7月文史馆在组织外调与馆员本人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再制定“馆员人事记录卡”。档案材料显示：郑达甫66岁，家庭成分是小资渔民，出身小学教员，籍贯为浙江省镇海县，身体健康，曾用名分别为孝纲、佐宸。特长是国画（锦灰堆）。曾就读宁波第四中学，于1910年高中毕业后，从1911年起先后在启蒙小学、辅德小学当教员，1913-1915年在镇海城内僧立普益学校当教员，1915-1916年任化东一校教

员，1917-1919年在镇海县政府任书记，1919-1949年在上海鬻画为生，从1952年起在居住地昆明村居委会从事里弄文教工作。关于解放后表现，说他“52年后一贯积极搞里弄工作，现任宣教主任，各项运动都表现积极”。1954年他特别活跃，春节时画了一幅“锦灰堆”敬赠毛主席，获得中央有关部门复信致谢。他特意将此信配装镜框挂起来。同年他在大观园与海上书画名家熊松泉、谢之光、钱化佛等举办九友画展。他还兴致勃勃画了三幅画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但都未能入选，“因画题太左而退回”。因他的作品不合时代需要，画作没有市场，妻子钱氏又是家庭主妇，家庭收入只有每月救济金9元，加上郑在居委会工作每月津贴8元，一共仅17元维持生活。他受聘馆员后，每月的薪额是50元，一下子改变了生活窘迫状况。令我感兴趣的是，情况调查中关于他的专长和工作经历，两处都谈及了杨渭泉，一是“郑过去18年中的作品，由杨渭泉得名”；二是说到郑1918年来沪后，“1919年在杨渭泉手下作画，拆账生活18年。1938年起自画国画”。由此看来，郑达甫为杨渭泉代笔“锦灰堆”，记录在案，并非什么完全不为人知的秘密，郑逸老的“代笔人”一文对郑达甫的生平介绍，比较全面、翔实，基本准确，绝非信手拈来的道听途说，称之“戏说”故事是难以成立的。

细读郑逸老的“代笔人”一文，从“在上海有名的‘锦灰堆’画家，谁都知道是杨渭泉，认为他是此道的唯一能手。杨于十年前逝世，大家都很可惜他”，以及“杨渭泉自己既不能绘画，那么所有的作品，当然有人代笔的了。那代笔人是什么人呢？便是现在的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郑达甫”来分析看，此文约写于1960年前后。此文收录在郑逸老《清娱漫笔》一书，于1984年7月才由上海书店出版，其时距文章写成已二十多年了。不知该文当初是否发表以及刊于何处？郑达甫是否读到过，看到了又作何反应？我无从查知。

无独有偶，1964年4月，同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的黄中（1892—1975）先生写了篇题为《不会作画的“画家”》的文史资料。该文内容与郑逸老的“代笔人”文可谓异曲同工，因未曾公开发表过，我以为它对澄清“代笔人”案提

供了重要佐证，故引录如下：

本馆馆员郑达甫老先生擅长画“锦灰堆”。他画了自己也数不清的许多作品，但没有享过名。靠他的作品享名的是另外一人，姓杨，名渭泉。

郑先生年轻时，因避仇逃到上海，人地生疏，难以生活，经人介绍，当了杨渭泉的雇佣画师。杨渭泉把他养在家里，每月给他五十元雇佣费，要他天天作画。画好后，不许他署上自己的姓名，而由杨渭泉顶名盖章，拿出去卖钱或送人，作为在社交场中的活动工具。杨渭泉因此名利双收，成为专画“锦灰堆”的“画家”。

郑先生等于被雇佣的奴隶，行动没有自由，非得杨渭泉的准许，不得私自出外，更不许他泄露秘密，否则以停雇威胁。郑先生为了一家生活，只能忍受这些严酷的条件，整天埋头作画。

杨渭泉有的是钱，所有“锦灰堆”需要的画材，都能设法供给。因此郑先生画的“锦灰堆”，内容丰富，幅幅不同。如果需要的题材，杨渭泉也设法弄到，非要郑先生去观摩不可时，也只能由杨渭泉陪同坐了自备汽车同去，不许郑先生单独行动。

黄中先生在文中还谈及郑达甫因习惯“锦灰堆”的技法，曾制造出能以假乱真的假文凭。当然，郑达甫造假文凭的活，也是由他的雇主杨渭泉一手安排的。据黄文披露，在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上海有杨虎、陈群两个反共刽子手，其中陈群因谄叙的需要，由杨渭泉经手，安排郑达甫给陈群伪造一张日本明治大学的毕业证书，允诺给郑50元作为报酬。郑达甫把别人的明治大学的毕业文凭作为蓝本，凭着高超的技能巧妙地处理好“明治大学”四字的水印”，和原有的“水印”相比丝毫不走样。事后，郑达甫获得了难得的意外收入50元，但杨渭泉所得的酬劳要多得多。

黄中是与郑达甫同年进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名录”这样介绍他：“别名一华，上海宝山人。日本东京大学政治科肄业。曾任宝山小学教员，曾参加淞沪光复运动，后任大陆书局、金屋书店编辑，自办芳草书店，印行文艺书籍。内政部警政局科员，中国航空公司办事员。”他积极向周总理希望历史老人多写文史资料“存史资政”的号召，为文史馆写了多篇文史资料。对于写郑达

甫代画“锦灰堆”，他在文末坦然说明了资料的来源和写作初衷：“郑先生进馆后，初还顾虑，不敢谈出来。1958年馆里整风，我作私人访问时，他才给我谈出了如上所述。不知他写过这些经过没有？如果没有写过，我就写了这篇东西，请他去补正吧！”

那郑达甫对黄中的文章补正了吗？很遗憾的是，不仅没有，而且我以为他连这篇文章也没有见到——黄中的这篇文章因不符合文史资料的要求，结果被归入郑达甫的档案中了。当时负责史料工作的同志把文章交给负责史料工作的杨肇业，并明确告知这是陶菊隐副馆长、办公室苏峰主任的指示，还补充说：“黄中先生作为‘史料’送来，不合要求。”我为了解那时文史馆对黄中文章处理的具体情况，向今年已88岁的杨肇业先生求教，他一听我谈起郑达甫和黄中的文章，马上就想起了这桩半个世纪前的工作往事，对郑达甫印象深刻，说那是画“锦灰堆”的。据他见告，他是1961年3月6日到文史馆工作的，告诉他把黄中文章放入郑达甫档案的人叫陈丙一。陈当时负责文史资料工作，对馆员提交的史料稿件组织审读，杨肇业是按照陈丙一的要求处理黄中文章的。他只知黄中文章“不合要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不清楚，也没去想。那个时候，郑达甫不大来文史馆参加活动。

如今，我面对在郑达甫档案中长期沉晦的黄中文章，深感世事多变，感慨万分。我想，倘若当年文史馆的工作人员能依照黄中写文章的初衷，去请郑达甫核对或补充，那就不会让我们生不见郑达甫本人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回忆文字的遗憾了。

行文至此，我想说，翻案并非禁忌，历史研究是常在不断翻案中获得突破性成果，但翻案应有充足的证据，在证据不甚充足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生翻案之念。归根结底，翻案须基于事实，千万不应把话说满了，说过了，甚至于“无中生有”，以至旧案未翻，又制造出新的冤案。在我看来，罗青先生为杨渭泉的翻案文章，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愿拙文所谈，能为罗青先生关于近代上海的“锦灰堆”创作历史和杨渭泉父子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2019年12月15日

笔会

当庄子遇见

卡夫卡……

（综合材料）

魏惠东



草木散记

四季梅，是个什么梅？

何频

夏天去山上，在有“太行云顶”美称的陵川县避暑读书，我仔细读了一部1963年出版、郭沫若题署的《陵川县志》。

南太行是个大拐弯，晋豫上下唇齿相依，类似一盘石磨，晋东南所属的陵川处于枢纽，下面襟带辐射，自西向东而北，依次是河南的修武、辉县和林州（林县）等市县。例如，云台山风景区的老潭沟大瀑布和茱萸峰等归修武，但流水则源自陵川县的夺火乡，那里人因故造景曰上云台。上下云台，因水而连，悬崖千丈，直冲霄汉，蜿蜒曲折萦绕之修陵公路为穿山纽带。

这部县志扉页里的照片，有一幅是1963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笄在陵川视察林业与药材种植的黑白照片，——地方领导陪同他俩依着古树“四季梅”合影。

名为四季梅，但它的姿影不类梅树和蜡梅。反之，与北方习见的高大乔木，像落叶后的黄桷树和核桃树一样枝桠开张。那，这是个什么梅？

深秋再上山，退休了受聘在那里教书的二兄，陪着我们实地探访四季梅。

岭上紧挨着晋城过陵川去长治和壶关的公路，县城西门外有座小庙乃大树遗迹所在。一个闭门不开的小庙很静穆，是山神庙吧，白墙黄瓦，红艳艳大门配湖蓝色的楹联，门联及门额是：

一县好景四季梅

二神保佑万年春

一方清静

当年领导人合影的背景，有树无小庙；刻下有庙而无老树。说是多年前失火，将枯干的老树烧去了。周围并无人家，所谓“二神保佑”，不知何神。但森森柏树环列之间，大大小小逸生着五六棵树，曰老树儿孙。晋地海拔高而有天冷早，四季梅无叶了，树上和地上有零

星果实，萼梨果星形状梅红色，里边的种子是西洋红。这一看我有数了，我判断这是卫矛科的落叶树，叫丝棉木。山神庙吧，白墙黄瓦，红艳艳大门配湖蓝色的楹联，门联及门额是：

星果实，萼梨果星形状梅红色，里边的种子是西洋红。这一看我有数了，我判断这是卫矛科的落叶树，叫丝棉木。山神庙吧，白墙黄瓦，红艳艳大门配湖蓝色的楹联，门联及门额是：

这部影片上映在1993年，27年后的今天我才在一个无事可做的夜晚偶然翻看到它。影片说的是四位华人女性在美国颠沛生活的故事，主角没有吸引我，18分钟过去屏幕出现了一位眼熟的老太太，我立时打起精神，23分钟时出现了另一位老太太，一份莫名的惊喜涌上心头。两位老太太，一位是徐樱，一位是张元和，影片是《喜福会》。

身居檀香山的罗锦堂先生94岁了，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多年。由于相同的爱好——昆曲，近些年我们常常通信，航空信一来一往一个月。有回他的信里夹了页张充和的字给我，是幅平尺大小的小斗方，张充和娟秀典雅的楷书录了两首诗，一首是《八十一年访汉思充和两兄》：“故人十年别，半影墨正芳。本来寻旧梦，微荷愿未偿。孺教言兹在，引领来日长。东山渺新市，春谷灼秋阳。顾丰人似玉，笑觅昔时裳。”第二首是《赠罗锦堂唱曲》：“度曲不开口，随唱已十年。一旦歌喉振，四座咸惊喧。梦憩犹引吭，更深吠邻犬。闻师时切磋，佳话永曲坛。”落款：“右徐樱女士诗二首，林德嘱书，奉锦堂曲家清赏。丁亥充和。”徐樱是北洋时期将领徐树铮的长女、语言学家李方桂的夫人，也正是出演《喜福会》的那一位徐樱。徐树铮的大半人生起伏在军阀混战之中，但他对昆曲的热爱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徐樱自幼跟随父亲从苏州请来的名曲师习曲，所以对昆曲极为精通。李方桂受了她的影响，不仅爱上这支水磨调，还学会了吹笛子。林德是李方桂·徐樱的大女儿，1933年5月出生在上海红十字医院，2007年，她请张充和写了母亲这两首诗赠给了罗锦堂。

1949年5月18日，张元和与家人在人头攒动的吴淞口匆忙登上中兴轮，两天后的5月20日船到台湾基隆港。当晚一家人赶夜车来到台中，就此定居在了这里。她的先生顾传玠卸下车衫多年了，昆曲名小生转行成了一名商人，起初在台湾经营一家毛线行，叫中福行，雇有几位店员，生意算过得去。张元和则在家相夫教子，闲暇时读学元子唱昆曲。我有件张元和在台湾时写的条幅，正文是唐朝诗人张谓的诗《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左旁两行小字：“幼时曾读‘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句，吾甚喜梅花，不与万花争放，不畏严寒绽放……此花精神可嘉矣。张元和书于台湾。”这幅字写得温婉雍容，满是清清淡淡小桥流水书卷人家的气韵。然而台湾的生活颇多波折，随着顾传玠1965年病逝，1972年，张元和应徐樱的邀请去了美国。先是住在夏威夷徐樱家里，后来迁往旧金山，周有光、郑允和八十年代重游美国时在她家住过几个星期。周有光说张元和一个人在公寓太孤单，因此常常住在一个朋友家帮着照顾朋友家的孩子。

李方桂与徐樱在夏威夷生活了十多年，1985年随林德定居奥克兰。几年后张元和也搬来，住处离徐樱很近，两位老太太一起唱昆曲、打麻将，重又热闹了起来。1992年10月7日上午，张元和家的后门突然传来徐樱的叫门声：“大姐，大姐！”张元和开门问什么事，徐樱说来找她一同去拍电影，张元和无心电影，不过还是陪徐樱去了电影公司。在电影公司，一位女士给了徐樱戏中的台词请她念，导演称好。接着请张元和坐上椅子试镜，她拒绝了。“拍快照。”那位女士说。张元和对拍照是有兴趣的，于是答应。这一拍，电影公司指定了张元和为其中一个配角，张元和仍然没有兴趣，林德说：“大姐，您不妨参加演出，也许到大陆拍摄，可顺便回去探亲，旅游一趟。”另有友人劝她：“很多人想参加演这个戏，没有机会，既然选中你，何不去试试？”“元和，你脸型上镜头，所以被邀请，去拍吧。”张元和让他们说得心动了，想想只要不太辛苦，就试试吧。

两位老太太的戏在第二年的1月5日正式开拍。前一晚张元和住在徐樱家里，早上五点半醒来，一番梳洗后徐樱开车来到了柏克莱假日旅馆，接着换乘电影公司的车到达片场。先

《喜福会》中的两位爱昆曲的老太太

唐吉慧

要化妆，染发、敷粉、抹脂、点唇，发髻两旁插上红绒双喜花、红绢花，两位老太太顿时显得喜气洋洋。上午的镜头，导演请张元和牵着新娘向前走，眼睛看着新娘，再看旁边的宾客，如此来来回回走了十多次。下午是新郎新娘结婚的镜头，张元和手捧一个放着大红彩球带的长方盘送近徐樱饰演的媒婆身旁，由她取去彩球，而后张元和将空盘放在后面的椅子上，再将条儿上的花烛台交与媒婆。第二天较为轻松，上午拍新娘为了离开黄家，编造老祖宗在梦中的三个预兆，让黄太太信以为真的戏，其中有张元和与徐樱的特写镜头。晚上七点拍摄结束，她们的戏也就结束了。

三个月后的4月28日，上午时分，林德在家中厨房意外地见到窗外一只小鸟不停碰撞着厨房的玻璃窗，待她打开窗子，鸟儿已坠落在楼下凉台上不动了。林德惋惜不已。这时家中响起了电话铃声，她接起电话，友人的声音焦急如焚。友人说奥克兰中国城发生了一起车祸，两位中国老太太已被送去医院，一位是张元和，另一位可能是林德的母亲。林德匆忙挂上电话，慌慌张张开车去了奥克兰高原医院，可惜为时已晚，待她到达医院，母亲已伤重不治溘然长逝了。张元和则腿脚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原来那天徐樱约了朋友打麻将，欢欢喜喜地先接上张元和去中国城买午餐，几个牌友还定了晚上去林德家吃晚餐，未曾想遇上这样一次劫难。

《喜福会》在当年9月8日正式上映，两位八十好几的老太太在影片中出镜不过数十秒种，三两个小镜头，张元和甚至没有一句台词，但她们脸上布满夕阳的金光，那样硬朗，那样端庄。她们的多位熟人去观看了影片，见到张元和都要说一句：“我看到你演的电影了，很好！你的镜头很不错。”张元和一位曲友的儿子有一天带了十多位同学一块儿去看，待到银幕上张元和搀着新娘子出场，十多个人都站起来鼓掌，引得现场一片噓声。

张元和说她小时候父亲曾有过办一家电影公司的念头，她的堂兄因此说：“大姐，九爷要开电影公司，那我们都去当明星。”不过张武龄后来改变主意，在苏州办了一所乐益女中，“我的明星梦，到老了才实现，岂不有趣。”她说。遗憾的是，这部影片徐樱没有看到，而张元和离开我们也已多年了。

景区，绿化树很多丝棉木。再是距离麦积山石窟不远，天水有名的古寺南郭寺里，不仅横着最古的古柏，还有老大一株丝棉木倾斜着靠墙生长。北京也有，土名呼为卫矛。燕园末名湖临着大石舫，湖心岛有一片丝棉木，6月开花，黄绿色小花与卫矛科的大叶黄杨开花差不多。而相对于陵川人叫它四季梅，我的老家，山里人在门前栽树植绿用于避邪，有的是四楞卫矛，有的是丝棉木，统统称为鬼儿愁。

江南和南方也有。元旦在寒山寺听阳历年的年夜钟声，南门临河一角，出墙红树是一株老丝棉木。此树之叶水红色水灵灵的有点俏，不同于乌柏猩红严肃浓重。2019年5月底，朋友黄政一寄书给我，是远东出版社新出的《浦东中医史略》，书的末尾附了一个《浦东地区中草药选介》，也有丝棉木——

俗名添叶树，白桃树。枝、叶药用。外用解冻毒。主要用法：漆疮，适量煎服汤熏洗，也可与香樟木等量煎汤熏洗。

2019年12月13日于甘草居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